

- 1959年), 拉萨: 西藏社会科学院编印 1985年版, 第 235 页。
- [24] [德]贡德·弗兰克著、刘北成译:《白银资本: 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8 年版, “中文版前言”。
- [25] [日]松浦章著:《清代的海洋圈与移民》, 收入《来自于周缘的历史》, 东京: 东京大学出版会 1994 年版。
- [26] [日]滨下武志著、朱荫贵等译:《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 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 年版, 第 29 页。
- [27] [宋]司马光撰:《资治通鉴》卷 69《魏纪一》, “魏黄初二年三月”条, “臣光曰”, 《四部丛刊》初编本, 上海: 商务印书馆民国十八年影印宋刻本。
- [28] [日]渡边信一郎著:《中国古代の王権と天下秩序——日中比較史の視点から》, 东京: 校仓书房 2003 年版, 第 40~60 页。
- [29] [汉]班固撰:《汉书》卷 28 上《地理志上》, 北京: 中华书局 1962 年点校本。
- [30] [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 38《地理志一·序》,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 年点校本。
- [31] [宋]司马光撰:《资治通鉴》卷 215《唐纪》“天宝元年一月”条, 《四部丛刊》初编本, 上海: 商务印书馆民国十八年影印宋刻本。
- [32] 于逢春:《华夷衍变与大一统思想框架的构筑——以〈史记〉有关记述为中心》,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7 年第 2 期。

【论 文】

一九四二：继承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的政治谎言

——蒋介石的“民族主义”思想与民国时期的民族政治（一）

熊芳亮

1942 年 8 月, 正值抗日战争处于相持阶段的危难时刻, 蒋介石在青海省西宁市发表演讲, 首次公开提出“国族—宗族”论, 并于次年出版的《中国之命运》一书中对其进行了系统阐述。蒋介石提出以“中华民族”作为“汉、满、蒙、回、藏”的“总名称”, 并将“汉、满、蒙、回、藏”视为中华民族的“组成单位”, 且“各单位最确当的名称, 实在应称为宗族”。蒋介石宣称, “我们集许多家族, 而成为宗族, 更由宗族合成为整个中华民族”¹。

长期以来, “国族—宗族”论已经被视为蒋介石“民族主义”思想和南京国民政府民族政治的历史标签, 成为论证国民党和南京国民政府民族理论“反动性”的政治标本, 但其形成过程和思想渊源却至今成谜。

一种观点认为, 是孙中山先生的民族主义思想奠定了蒋介石“国族—宗族论”的思想基础。学界或将“国族—宗族论”视为蒋介石“承袭”孙中山先生的“遗训”的产物, 认为“国族—宗族”论是蒋介石“依据国父遗训——‘家族—宗族—国族’模式对中华民族作出解释”¹; 或认为“国族—宗族论”是蒋介石在孙中山民族主义基础之上的“衍化”和“发挥”, 认为南京国民政府的民族认识“既继承了孙中山民族主义中民族平等、团结、五族共和等认识, 同时在实践中受到国内外政治思潮与现实政治环境的影响将孙中山的国族理论及民族同化思维进一步发挥, 宣

¹ 蒋介石:《中华民族整个的共同的负责——中华民国三十一年八月二十七日在西宁对汉满蒙回藏士绅、活佛、阿訇、王公、百户、千户讲》。秦孝仪编:《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十九), (中国台湾)中央文物供应社, 1984 年, 第 216—218 页。

传中华民族一体观，进而衍化出宗族理论”²。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顾颉刚、傅斯年等人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观点，为“国族—宗族”论提供了理论依据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如黄天华认为，“国民党在孙文‘三民主义’的基础上，借顾颉刚等‘禹贡派’的理论，提出了较为完整的国族概念”³。而马戎也推断，傅斯年“中华民族是整个的”观点，对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所提出的“中华民族宗支论”“很可能也有一定影响”⁴。

就第一个观点而言，其始作俑者正是蒋介石本人。蒋介石一再声称“国族—宗族”论沿袭了孙中山先生“先有家族，再有宗族，再有民族”的“民族主义”思想⁵。然而通过对比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历史事实显然并非如此。

第一，就理论体系而言，蒋介石的“民族主义”思想构建在伪篡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的“戴季陶主义”的基础之上，而不是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之上。自1905年在《民报》发刊词中首次提出包括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的“三民主义”之后，孙中山的三个“主义”一直就是浑然一体、密不可分理论体系。就民族主义而言，孙中山要“团结四万万人的大力量，共同奋斗”，对内中华各民族平等团结，对外中华民族独立自主，“为国家争自由”⁶；就民权主义而言，孙中山要实现“政权”（人民之权）与“治权”（政府之权）的分离，分别设立“四权”（选举权、罢免权、创制权、复决权）和“五权”（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考试权、检察权），实现“人民政治地位”之“平等”；就民生主义而言，孙中山要“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为四万万人民谋幸福”。在孙中山看来，民族主义就是“自由”，民权主义就是“平等”，民生主义就是“博爱”⁷，其核心目标就是要实现“国家是人民所共有，政治是人民所共管，利益是人民所共享”⁸，三者内容上不可或缺、在程序上相辅相成。孙中山先生逝世之后，国民党内派系林立，而派系斗争最常见的方式，除了军事上的兵戎相见，权力上的相互争夺，政治上的相互倾轧，在思想和意识形态领域的争夺同样白热化——争夺的核心和焦点，就是看谁是继承和代表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思想的“正统”。国民党右派理论家戴季陶⁹连续撰写了《孙文主义哲学的基础》及《民生哲学系统表说明》、《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鼓吹“纯正的三民主义”，形成了一套反共理论体系，得到国民党新、老右派的广泛认同，史称“戴季陶主义”。“戴季陶主义”迎合了国民党右派势力的反共、反苏立场，不仅实现了中国国民党右派的组织联合，为国民党右派叛变革命奠定了思想基础，并且成为蒋介石思想体系的理论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周恩来认为，蒋介石之所以变成“新右派”，“其灵魂便是戴季陶”¹⁰。蒋介石对“戴季陶主义”推崇备至，将之视为

¹ 郝时远：《中国共产党怎样解决民族问题》，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53、64页。

² 段金生：《南京国民政府的边疆观念及民族认识》，《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

³ 黄天华：《民族意识与国家观念：抗战前后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论争》。载于《一九四零年代的中国（下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

⁴ 马戎：《“民族”之辩——从1939年的那场大讨论说起（一）》，中国民族报，2012年11月2日，第07版。

⁵ 蒋介石：《三民主义的本质——伦理、民主、科学》（1952年7月7日在青年夏令讲习会讲）。秦孝仪编：《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三），（中国台湾）中央文物供应社，1984年，第174页。

⁶ 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权主义·第二讲》（1924年3月16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等合编：《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82页。

⁷ 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权主义·第二讲》（1924年3月16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等合编：《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83页。

⁸ 孙中山：《三民主义·民生主义·第二讲》（1924年8月10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等合编：《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394页。

⁹ 戴季陶在国共两党的历史上都具有特殊的地位和意义。一方面，他长期跟随孙中山，与孙中山、蒋介石等国民党政要关系密切；另一方面，他又曾与陈独秀、李汉俊等中国共产党早期理论家和领导者交往甚密，甚至一度参与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工作，起草建党文件，最终因为排斥“阶级斗争学说”并遭到孙中山的反对而退出。戴季陶对孙中山的思想脉络一清二楚，对马克思主义亦有深刻的了解和研究，其扎实的理论功底和顽固的反共态度，曾让鲍罗廷将之视为威胁中国共产党的“五毒”之一。

¹⁰ 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周恩来选集》（上），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66页。



奉行三民主义的圭臬，认为“凡是亲承总理教训的人”，“都承认”戴季陶的《孙文主义哲学的基础》“能真实表达总理思想学说的全部精义”¹。宣称继承孙中山先生政治遗志和思想衣钵的蒋介石，在伪篡、捏造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的道路上走得比戴季陶更远、更彻底。蒋介石进一步发挥戴季陶把“三民主义”划分为“能作”、“所作”两部分的思想，以“知”、“行”学说统领“三民主义”，将孙中山“三民主义”视为纯粹的“原理”和“理论”，另起炉灶专门炮制了一套“三民主义实行程序”，为其继续打着“三民主义”旗号宣扬并推行其政治主张、施行专制统治奠定了思想前提。戴季陶“纯正三民主义”的政治重心以“民生”为首要，认为三民主义的本质就是“一个主义”——民生主义，“民族”和“民权”不过是实现于“民生主义”所必经的过程和阶段，而民族、民权、民生三个主义的实现又以民族精神的恢复为基础，实际上将“三民主义”构建在“精神”和“意志”的基础之上。蒋介石政治思想的重心则将“建国”列为三民主义的首要政治任务，将三民主义分解为“五个建设”（心理建设、伦理建设、社会建设、政治建设、经济建设）、三个方面（教育、军事、经济），服务、服从于其“建国”的政治目标，完全背弃了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的原意和初衷。

第二，就目标对象而言，蒋介石“国族-宗族”论完全颠覆了孙中山新民族主义反帝国主义的革命性，而是服务、附属于独裁专制统治的政治需要。孙中山新民族主义是“对外”的，其目的一要恢复地位，即“中国民族自求解放”，恢复中华民族的独立自主地位，解除帝国主义和西方列强对于中国人民的压榨压迫；二要实现团结，即“团结国内各民族，完成一大中华民族”；三要扶持弱小民族，使其能“自决自治”。孙中山先生强调，“民族主义是对外国人用的”²，“就是要中国和外国平等的主义”³，“不许外国人欺负中国人”⁴。而在蒋介石的政治理论框架之中，“民族主义”是“对内”的，其首要任务被蒋介石转换为“恢复民族精神”和“民族道德”，提出“要御外侮，救中国，根本的问题，第一就要恢复我们固有的民族性”⁵，“有了国魂，才可以抵御外侮，完成革命”⁶；而要恢复“民族精神”、“民族性”，实现“中国的国家民族复兴”，“就先要恢复中国固有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民族道德”⁷。蒋介石以恢复民族性、民族精神为抵御外侮、复兴民族的前提；恢复民族性、民族精神，又以恢复“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民族道德”⁸为基础；恢复“民族道德”，又以“知行易的革命哲学”为实行⁹，通过一系列概念转换和逻辑推理，以所谓的“心理建设”、“伦理建设”¹⁰取代了以反帝、反封建为目标、

¹ 蒋介石：《三民主义之体系及其实行程序》。转载于蔡尚思主编：《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四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27页。

² 孙中山：《在广州农民联欢会的演说》（1924年7月2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等合编：《孙中山全集》（第10卷），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9页。

³ 孙中山：《在广东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校庆纪念会的演说》（1924年4月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等合编：《孙中山全集》（第10卷），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9页。

⁴ 孙中山：《在广东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校庆纪念会的演说》（1924年4月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等合编：《孙中山全集》（第10卷），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30-31页。

⁵ 蔡尚思主编：《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三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87页。

⁶ 蔡尚思主编：《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三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97页。

⁷ 蔡尚思主编：《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三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87页。

⁸ 所谓“智仁勇之三达德，及其所以行此达德之诚字”，被蒋介石视为“民族德性的结晶”。蒋介石：《中国之命运》。蔡尚思：《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四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46页。

⁹ 蒋介石“力行哲学”的核心，就是“一切方略程序，总理已经为我们详细的订定了，我们只须按照方略，依着实行，各就行性学识之所宜，确定计划步骤，本平良知良能，竭尽我们救国救民的本职，勇往积极的去做，就必然能达到目的”，“因为我们都是后知后觉，我们除了基本的革命大义以外所知的实在是有限，因此我们一方面固然应当竭力求知，同时还应该从力行中去求真知，凡是我学问经验中认为已经获得的知识，如果不是经过实行而真名为有效，就不能断定所知者果为真知。所以我们一切的事业，必须实行而后始有真知，也唯有能行而后能知”。蒋介石：《行的道理（行的哲学）》（中华民国二十八年三月十五日讲）。刘健清编：《中国法西斯主义资料选编》，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1984年版，第144页。

¹⁰ 蒋介石将“三民主义”化解为五个建设：心理建设、伦理建设、社会建设、政治建设、经济建设。参见蒋介石



以实现民族独立解放为目的的“新民族主义”，最终将反帝、平等、民主的“民族主义”完全“伦理化”，成为服从、服务于蒋介石推行“奴化教育”、进行思想钳制、施行独裁专制的统治工具和政治借口。

第三，就基本概念而言，蒋介石的“国族-宗族”论蓄意歪曲了孙中山的“国族”、“宗族”概念。蒋介石的“国族-宗族”论由两个论点组成：一是中国境内各民族同属“中华民族”的“国族”论；其次就是将汉、满、蒙、回、藏各族视为“中华民族”的“组成单位”并称之为“宗族”的“宗族论”。孙中山“新民族主义”所使用的“国族”概念，以承认各族之间在“血统”、“生活”、“语言”、“风俗习惯”等方面的差别¹，承认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的现实为前提，完成了从基于血缘、语言、文化、地域基础之上的“民族”概念，再到基于全体国民基础之上的“民族（国族）”概念的转变²。而蒋介石的御用理论家戴季陶认为，“民族是以文化为基础，是在同一的血统，生活，语言，宗教，风俗习惯，和种种复杂的历史原因上面构成的”³，“中国民族是以一个同文化的民族做基础，中国人民说是有四万万，这四万万当中，是一个中国的民族，因为数千年的中国历史看来，中国是一个主要民族在同一文化当中建设起来的”⁴。蒋介石显然深受此种观点的影响，强调“就民族成长的历史来说”，“中华民族是多数宗族融合而成”，“融合的动力是文化而不是武力，融合的方法是同化而不是征服”，宣称中国历史“以我悠久博大的文化，融合四邻的宗族”，使其“成为我们整个民族里面的宗支”；“中华民族各单位”“若非同源于一个始祖，即是相结以累世的婚姻”⁵——其“国族”概念以血缘、文化为基础而不是以“全体国民”为基础。其次，孙中山所使用的“宗族”概念，只是孙中山借助以实现“国族团结”的社会“旧团体”之一种。在《孙中山全集》中，孙中山无一处称少数民族为“宗族”，更无一处使用具备“民族”或相关意义上的“宗族”概念。1924年，孙中山在《三民主义》系列讲座中强调，要实现民族主义就要进行三个方面的工作，其中之一就是要“善用中国固有的团体”，发挥传统组织的作用。在孙中山看来，要结成大团体，便要有小基础，这样联合起来，才容易成功。而中国可以利用的小基础，就是宗族团体和家乡基础，“若是拿这两种好观念做基础，便可以把全国的人都联络起来”⁶。孙中山在阐述“中国国民和国家结构的关系，先有家族，再推到宗族，然后才是国族，这种组织一级一级的放大，有条不紊，大小结构的关系当中是很实在的”的同时，提出“如果用宗族为单位，改良当中的组织，再联合成国族，比较外国用个人为单位当然容易得多”⁷，充分表明“宗族”是相对于“个人”而言的“社会团体”，与蒋介石所用以替代基于血缘、文化、语言、地域基础之上的“民族”概念相去甚远。蒋介石对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先有家族，再有宗族，再有民族”的理论概括，显然是对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的刻意歪曲。

以上可以看出，蒋介石对孙中山先生的“新民族主义”思想进行了颠覆性的篡改与体系性的歪曲，所谓继承孙中山先生的“遗训”炮制“国族-宗族”论的观点，不过是蒋介石集团处心积虑编造的一个政治谎言。

石：《三民主义之体系及实行程序》。蔡尚思：《中国现代思想史料简编》（第四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¹ 孙中山：《民族主义》（第一讲，1924年1月27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等合编：《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87—188页。

² 参见熊芳亮：《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的灵魂和精髓——国民党一大宣言及其对民国民族政治的影响（四）》，《中国民族报·理论周刊》，2012年8月3日。

³ 戴季陶：《三民主义的国家观》。《戴季陶讲演集》，上海新生书局，1928年版，第138—139页。

⁴ 戴季陶：《三民主义的国家观》。《戴季陶讲演集》，上海新生书局，1928年版，第137页。

⁵ 蒋介石：《中国之命运》（1943年）。

⁶ 孙中山：《民族主义》（第五讲）。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等合编：《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38页。

⁷ 孙中山：《民族主义》（第五讲）。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等合编：《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



【论 文】

一九四二：蒋介石炮制“国族-宗族”论的政治动机

——蒋介石的“民族主义”思想与民国时期的民族政治（二）

熊芳亮

蒋介石之所以炮制“国族-宗族”论，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其原本所坚持的“放任”、“分治”的民族主义路线，在抗日战争期间已经成为众矢之的、臭名昭彰。

1927年，国民党蒋介石、汪精卫集团先后叛变革命，窃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建立了南京国民政府，并于1928年12月实现了中华民国形式上的统一，但国民党内部在如何认识、理解和继承孙中山先生的民族主义思想遗产，尤其是如何对待“国民党一大宣言”所主张的“民族主义”路线问题上，依然存在严重的政治分歧。“西山会议派”极力否定国民党一大宣言的“民族自决”主张，称“如是自决，则满族自决，而东三省亡于日；藏族自决，而西藏亡于英”，强调要坚持“孙先生手著之国民政府建国大纲”所规定的民族主义，而非国民党一大宣言所规定的民族主义，主张在“汉、满、蒙、回、藏人民团结的基础上”实现“国族融合”¹。而蒋介石的御用理论家戴季陶，则主张继续实行国民党一大宣言所主张的“民族自决”，允许蒙藏“独立”。戴季陶将中国的民族问题划分为“小问题”和“大问题”两个部分。所谓“小问题”，是指“苗，瑶，罗罗”等“散在国内的很小数的民族”而言，戴季陶主张“完全以政治力在平等的条件上面统治他们感化他们”，也就是“厉行同化”。所谓“大问题”，是指蒙古，西藏问题，戴季陶主张“以尊重独立为原则，以平等的自由的联合为原则”²，提出“要承认蒙古独立”，“要尊重滇（西）藏的独立，尊重西藏的自由”³，完全置孙中山所宣示和追求的“国家统一”、“民族统一”、“行政统一”于不顾。

作为国民党政权的“领袖”和最高决策者，蒋介石在抗战之前虽不敢公然宣扬“分裂”、“分治”，但其在民族问题上所采取的“放任主义”态度，足以证明其深受戴季陶的影响。1934年，蒋介石在南昌就外交、边疆问题发表演讲，其时东北沦入敌手，华北岌岌可危，内蒙眼见不保，蒋介石竟然出奇的淡定，不仅将国土沦丧的政治责任推卸给“实力不济”，将“边疆离析”轻描淡写地称为“体面”问题⁴，提出对“边疆问题”采取“放任”政策，并强调“在今日情势之下，虽欲不放任，事实上也只能放任”⁵，打着“师苏俄‘联邦自由’之意，依五族共和之精神标明‘五族联邦’之政策”的幌子，宣称“五族联邦”“乃今日应付边疆之惟一有效途径”⁶，幻想着“一旦国际大变发生，即可乘机奋起，统一复兴，时不在远”，试图引导国民党接受“除本部应为整个的一体以外，边疆皆可许其自治而组织五族联邦之国家”⁷的主张。

抗日战争期间，蒋介石“放任”、“分治”的“民族主义”激起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强烈愤慨和

1986年版，第239页。

¹ 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480—481页。

² 戴季陶：《三民主义的国家观》。《戴季陶讲演集》，上海新生书局，1928年版，第142—143页。

³ 戴季陶：《三民主义的国家观》。《戴季陶讲演集》，上海新生书局，1928年版，第143—144页。

⁴ 蒋介石：《东亚大势与中国复兴之道》（中华民国二十三年三月五日在南昌北坛官邸讲）。秦孝仪编：《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十二），（中国台湾）中央文物供应社，1984年，第98—99页。

⁵ 林恩显：《国父民族主义与民国以来的民族政策》，国立编译馆1994年版，第193—195页。

⁶ 蒋介石：《中国之边疆问题》（中华民国二十三年三月七日在南昌北坛官邸讲）。秦孝仪编：《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十二），（中国台湾）中央文物供应社，1984年，第105—109页。

⁷ 蒋介石：《中国之边疆问题》（中华民国二十三年三月七日在南昌北坛官邸讲）。秦孝仪编：《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十二），（中国台湾）中央文物供应社，1984年，第105—109页。

